

## 八、黄教的胜利

达赖五世的选定也许是一个想使黄教与传统上属于其它教派的家族联合起来的尝试。这个新教派的最高权威的化身被决定自一个同帕木竹巴关系密切的家族里选出。事实是：未来的达赖五世罗桑嘉错（BLo bzan raya mts'o），生于1617年（火蛇年），父名霍尔都杜饶登（Hor bDud 'adul rab brtan）<sup>(123)</sup>，母名贡噶拉则（Kun dga lha mdsas），属于穷结家族，这家几代以来都在帕木竹巴宫廷中担任大臣。母亲是浪噶子（sNa dkar stse）家族的后裔，著名的萨迦本勤阿格仑（Ag len）就是这个家族的人。但是罗桑嘉错出生的环境是在红教——不论是噶玛派或是主巴派（<sup>a</sup>Brug pa）——的影响下；这家小贵族的宫廷重臣和军队统帅都公然自称是红教的信奉者。

甚至于在罗桑嘉错还没有被寻认为黄教教主的化身以前，噶玛巴就想独占他，说他是贾曹噶玛巴（rGyal t'sab Kar ma pa）的化身（avatāra）或者是拉孜地方的主巴喇嘛的化身（p.25b）。还不仅如此，穷结家族自夸是印度沙合尔（Za hor）的后代，但采用一种间接的方法，因为达磨波罗王（Dharmapāla），即穷结家所奉为祖先者，据说曾移居巴察霍尔（Bhata Hor），隐居修行，此地在白格尔（Pe kar）王所统辖的霍尔（Hor）国内。穷结王子接受这一传说，就承认并证明他们同西藏正式保佑者吹仲（C'os skyon）

有亲属关系。吹仲住在莲花生祖师所开创的桑耶寺中，这座寺院在被移交给萨迦巴、又被格鲁派统治以前，一直是宁玛派传统的辉煌的中心。的确，从罗桑嘉错的卷帙浩繁的著作来看，他的文化素养和文章受到他早年接受的宁玛派的宗教教育的影响极深。这些文章都表现著者对于宁玛派和噶玛派的学说有精深的知识，在黄教的文献中至今还是独一无二的例子。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教文献却越来越变得顽固排外了。

可是穷结家族很早就对宗喀巴的改革表示同情，从霍尔班觉桑波 (Hor dPal 'byor bzan po) 的时候以来就和噶当派的改革派建立起友好的关系，班觉桑波曾任京俄锁南札巴 (spyān sna bSod nams grags pa, 1359—1408) 的索本即司礼仪官 (gsol dpon)，又任将军 (dmag dpon)，又曾被任命为娘麦 (ñan smad, 今日喀则) 的桑主孜宗本。照传记上说 (p. 16a)，班觉桑波是根敦主的弟子，完全皈依了新教，以故他保护黄教，成为兴建札什伦布寺的主要捐助人。这种良好的关系和友谊延续到根敦嘉错时代。

穷结巴对黄教的同情看来似乎无可否认，而且当我们忆起上述关于迦举派和噶当派的接触和关系时，这也容易得到解释。但是也不能否认，罗桑嘉错执笔写书在黄教(即通常认为噶当派的后继者)的胜利已成定局时，也许他在这里强调了他的家族的古老的正统性。

这位未来的达赖五世全名是衮噶明居多嘉汪季嘉波 (kun dga' mi 'gyur stobs rgyal dbaṅ gi rgyal po) (传记 p. 23a)，是由班禅仁波且、下院 (gLin smad) 的雪仲 (ṣabs drun) 衮乔群培 (dKon mc'og c'os 'p'el) 寻认的，同行者还有甘丹颇章的擦哇噶纠巴 (Ts'a ba bKa bcu pa) 桑结

喜饶(Saṅs rgyas ṣes rab)、拉尊(Lha btsun)和洪台吉的一些官员(mi sna) (p.27) (124)。这些贵族和蒙古头人所承担的寻认灵童的身份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表示由锁南嘉错建立的由云丹嘉错加强了的黄教与蒙古的关系现在把黄教的命运同蒙古部落的武力支持紧紧地连在一起。相反地，藏巴汗噶玛丹均(Kar ma bstan skyon) (p.27b)在这灵童受戒时却不出席。或者说，因为他还年轻(1621年这些事情发生时，刚十六岁)，由内大臣衮聂本官巴(Naṅ bloṇ mGon gñer Bon gon pa)，外大臣岗举巴拉(P'yi blon sGaṅ jug pa lba)掌握的政府反对派遣代表到新转世的达赖那里去，他们猜疑黄教派同蒙古人的良好关系。黄教与后藏间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这时后藏盛传在黄教支持下蒙古重新侵入西藏的谣言。1621年确实拉尊和洪台吉率领的蒙古军来到前藏，受到藏巴汗的抵抗，在杰塘冈(brGyad t'aṅ sgaṅ)一役中藏巴汗败北。藏巴汗撤军，逃避到他已设防的拉萨的甲波山(Lcags po ri)上；入侵的蒙古人在那里把他包围了(125)。藏军大约共一万人，被蒙古军压垮，很快就打败了；他们疲惫已极，准备投降。这时格鲁巴出面调停了：札什仑布寺的班禅和衮乔群培自愿当说和人，这就拯救了藏军，使他们上下都免遭屠杀。但是奸计不该误认为慷慨；首先他们以居间人的姿态出现取回了大部分为藏巴汗所并吞的庄园以及在红帽派僧正们的主张下被迫改宗的寺院。其次，他们并不愿意西藏仅有的唯一武装——这支还可以依靠的力量完全被歼灭。黄教的领袖们同蒙古人的关系非常友好，设法增进蒙古人的专诚和服从黄教的政策，可是这些领袖们知道蒙古头人们的同情心也会变，因此他们想：最适当的办法

是现在保住后藏的武装以防卫一切可能出现的侵略的危险。

不久，年轻的罗桑嘉错在蒙古人的监护下长大。1622年，在班禅和其他从西藏蒙古来的显要人物的陪同下，这个小孩子到了哲蚌寺，受到以协敖锁南饶登（*ṣal no bSod nams rab brtan*，见传记p.p.26b,29b,30b等，31a等参阅隆多喇嘛传a,p.15b，此书不叫他协敖而称为管家即*P'yag mdsod*）为首的色拉寺、哲蚌寺僧侣们的欢迎。

支持这位年轻的喇嘛和黄教的最有权威的蒙古人，正如上面谈到的，是拉尊罗桑丹津嘉错（*Lha btsun BLo Saṅs bstanādsin mt'so*）（此人在传记 p30a 上被称为成吉思汗的后裔）和洪台吉<sup>(126)</sup>。1625年图巴台吉（*T'ab pa t'ai ji, TobaTai ji*），济农王（*Ji non rgyal po*）之子，白帐部王子，<sup>(127)</sup>也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到达哲蚌寺（p.39p）。他是青城即库库浩特土默特四万军士的首领（p.40a），带来一大批随行人员，包括一些大贵族和有威信的人。

黄教和蒙古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蒙古贵族和朝覲者不断到来，珍贵的礼品频繁奉献给新教，证明这个未开化的民族优礼尊敬宗喀巴的新派，这不能加深了藏巴汗的嫉妬和怀疑。他也在西藏之外寻找援助，但首要的是缔结一个联盟可以孤立黄教派，使僧俗社团牢固地联合起来同黄教作斗争。我们不该忘记藏巴汗很信赖西藏本身力量。他发现他同最后帕木竹巴地位相埒，事易时移，帕木竹巴派这时已经为人遗忘，可是，在一定意义上，藏巴汗又拾起并继续那曾经激励过绛曲坚赞的维持西藏民族光荣的事业。绛曲坚赞曾经挣脱元朝的羁束，摆脱昔日萨迦派屈服顺从的外国势力的影响，同样，后藏的君主，目睹同蒙古人联盟带来的危险，把那些



惧怕新事的老贵族和怀疑黄教的扩展的老宗教团体，统统拉拢到自己的周围。1631年噶玛丹均在日益增加的危险面前采取行动，盼望能躲避危险，开始策划反对格鲁巴，显然取得成功，因为达赖喇嘛和协敖逃难到内邬栋，同那时已经衰零的绛曲坚赞的后代住在一起了。

然而一些蒙古贵族来到哲蚌寺使藏巴汗更加警惕。以阿克岱青(A k'ai dai c'in)为首的一千名喀尔喀人(p. 66c)，玛甘诺延(Ma rgan no yon)率领下三百名厄鲁特人(Oirat)，上面提到的拉尊琼瓦(Lha btsun cun ba)和洪台吉的三百名土默特官员，护送着卓尼(Co ne)的达尔干却吉(Dar k'an c'os rje)、札第秋科(Brag ti c'u skor)的医生(Em ci)、右翼(Ba ran k'ar)的官员多吉僧格(rDo rje sen ge)等人所领导的青海朝圣者进藏。在他们到达后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仪式，会上蒙古人表演战争技术，炫耀战士的精悍。突然第悉藏巴汗动员了(p. 68b)。这真出乎格鲁巴意料之外，格鲁巴曾多次协商，避免事态的迅速恶化。

格鲁巴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仅仅用当地军队在西藏打仗，他们没有把握能够获胜；他们还没有足够力量同那些既保卫自己学说的威望又捍御自己古老的特权军事贵族和敌对寺院来作战。所有这些理由促使格鲁巴争取时间，因为至少当蒙古人马上迅速回到故土，阴霾在平线上消失时，最需要这样做。

此后不久蒙古人又开始涌入西藏：1633年（水鸡年）土默特和鄂尔多斯的朝觐者来了，要求修习密法。但另外从蒙古来的人并无很大的信心。1632年，历史记载霍尔下部(Hor

smad) 盗贼来侵扰,某些喀尔喀首领竟远抵止贡寺,但很快撤退了(128)。教派的支特人也到达了,如永谢卜(Yun šī yi bu) 的官人(dpon) (129) (p.69b) (p.74 称为Yüu si yi kar ma yil da), 他信奉噶举派,他之现在来到西藏是因为察哈尔林丹汗(Legs ldan khan) 毁掉他的统治。他访问了拉萨、哲蚌和粗朴(mTs'ur p'u), 黄教曾争取他改宗。

同时,对西藏全区更严重的威胁在聚集,说确实些,这种威胁刚刚开始时是针对黄教派的。蒙古发生了几件事情,使部落的长年战争更加剧烈,促成新的联盟,造成游牧帐落不停地迁徙。因而不少战败的和受迫害的部落开始流入西藏。正如达赖五世写道(传记p.77a),1634年“此前六个阻卜部落已经结成一部,在连续战争中所受的损失以外,他们并没有不正义的行为,但察哈尔的林丹汗和却图汗(C'og tu) 却造下不少罪过的例子”。

这时,这个威胁来自喀尔喀蒙古却图部。却图汗之子阿尔斯兰(Ar sa lan, Ārslān), 在1635年秋,侵入西藏。他是为了掠夺而来到西藏的;第一个受害者是噶玛巴。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和蒙古的游牧部落的来到,黄教和红教这两个敌对派别,都乞求入侵者的好感并拉拢阿尔斯兰到自己一边。红教僧人首先接近了他,这是藏巴汗鼓励并派遣他们去的结果,当阿尔斯兰一到了拉萨,听从红帽饶绛巴(Rab a'byams pa) 的建议和请求,就同藏巴汗合为一气(130)。

这样阿尔斯兰就公然声称他是黄教的敌人,可是对较小的派别如萨迦派,则漠不关心。这样做,他正是完成了他父亲的指示。他父亲是一个红教的支持者,曾经成功地把察哈尔的林丹汗也从黄教一边拉了过来(130)。林丹汗改宗政策也

有他自己的动机，他看见厄鲁特固始汗(Gu šri khan)的势力越来越咄咄逼人；固始汗对黄教徒的同情是尽人周知的，而蒙古部落，不堪林丹汗的虐政，叛离林丹汗的越来越多。

那么，西藏人所寄托以厚望的联盟不太可靠了。信仰随着政治局势很容易转换。黄教感化入教的部落也并不是都可以信任的：对立教派的阴谋、变化不测的局势、种种机缘可以突然打破原来的政治上相互理解和支持的平衡。可是格鲁派不肯罢休，通过精明的策划，他们成功地包围了阿尔斯兰，阿尔斯兰逐渐改变态度，最后完全转过来了。

1635年底，由伊尔克济桑(Er ke ĵai san)率领的蒙古右翼到达了止贡，由止贡南行，带着两批俘虏，他们将这批俘虏送去彭域(aP'an yul)，约有二百人的一支队伍到达拉萨，然后到哲蚌，焚烧了村庄。素尔巴(Zur pa)——达赖五世罗桑甲错曾写了他的传记——并没有畏惧，勇敢地前去迎敌，使甘丹寺幸免于兵燹。他并且成功地把伊尔克济桑转信黄教。当蒙古右翼改换了他们的效忠对象，从红教转为黄教时，阿尔斯兰也跟着改了。当时他在羊卓(Yar ābrog)，但他已经改变了信仰。这并不足为奇。阿尔斯兰没有什么宗教热情，任何精神上的感召，不会使他动心，他唯一关心的只是到处劫掠。他于是派遣左翼蒙古去打藏巴汗，攻下日(喀)则和江孜，到处杀人放火，但是当他到达岗巴拉山(sGam pa la)时，洪台吉猛扑这支零散的军队，把他们杀的杀，驱散的驱散。剩下的又染了天花，死亡殆尽。是时天花正在西藏到处流行。这时又加上一场入侵，西藏大部分土地残破不堪，而这两个对立的教派即黄教和红教却没有一个人参加这场战争。唯一的牺牲者是阿尔斯兰，因红帽饶绛巴向

阿尔斯兰的父亲告发他是叛徒，于是在后者命令下阿尔斯兰连同其三名武官被害了（1636）。

在这些事件发生不久以后，察哈尔却图汗在蒙古的政权复灭；厄鲁特的固始汗和巴都尔洪台吉（Pā t'ur Hun t'ai ji）联合起来（p.84a），在1637年一下子把却图的三千名军队消灭了。

固始汗消灭了对手以后，伪装为朝觐者来到拉萨。随从他的有卓尼的法王（C'os rje）、土尔扈特（T'og rgod, Torgut）的王子那木札勒（rNam rgyal）（p.84b），一共一千人。这次罗桑嘉错赠给固始汗以丹津却吉杰波（bsTan ḁdsin c'os kyi rgyal po）的称号，后者作为报答赠给达赖五世属下官员以各种称号（p85.b）：对协敖（žal ŋo）给予达赖强佐的称号，对仲美内（Groñ smad nas）给予了济善第巴（Jai e sañ sde pa）的称号，对绛俄内（Byañ ŋos nas）札西彭错（bKra šis pun ts'ogs）给予乌尔沁第巴（Ul cin sde pa）的称号，对墨尔根逊巴（Mer gen gžon Pa）给予鄂托齐（O t'o c'i）的称号，对达东内（sTar don nas）给予觉日图达尔汗（Jo rig t'u dar k'an）的称号。在回到蒙古以后，固始汗于1638年派使者去迎请达赖五世；使者中有墨尔根喀巴喜饶嘉错（Mre gen dka pa šes rab rgya mts'o）、济善梅迪其（Jai sañ Me dei c'i）和济善国师（Jai sañ gu sri）（p.89a）。但由于协敖的劝告，邀请没有接受；达赖推迟了行期，就在这时，事件连续发生：1640年（铁龙年）蒙古部为了讨伐白利王子<sup>(132)</sup>，到达喀木（Kams）即康区中部。白利王子一直反对固始汗，保护本教，迫害各个喇嘛派。后藏之“王”依然势力很大，对黄教是一个经常



的严重的威胁。

我把桑主孜的王子称为“王”(Kings)，因为他们拥有后藏地方的至高的权力，对前藏也有统治权。实际上，《蒙古源流》和汉文史料都称之的“汗”，但正统的西藏史家则称之为“第悉”(sde srid)，此言摄政，这样一个比较平常的名字，或者简单地叫藏巴(gTsañ pa)，即“后藏的人”。这样他们不承认他是个王。法王(C'os rgyal)，即依佛法治理并护持佛法之王，在西藏史家眼目中，依然是帕木竹巴一系。后藏的统治者——仁蚌诸王子系统是帕木竹巴的叛臣。黄教仍然忠于帕木竹巴——它的早年的保护者，从来不承认后藏诸王的称尊。第悉们越俎代庖、滥用职权，被黄教徒认为是背叛主君的篡夺王位者。但是后藏的统治者不理睬这种反对，即使在前藏他们也有支持者，而我们应该忘记，拉萨一直由他们的官员统治着。

藏巴汗一系在许多黄教寺院派驻了教诲师(mc'od gnas) (133) (p. 96b)；藏巴汗的精神上的指导者和最喜欢的喇嘛都属于或多或少敌视黄教的旧派，如萨迦派、迦玛派，和觉囊派(Jo nañ pa) (p. 96b)，这些对黄教徒来说都似芒刺在背。

藏巴汗厌恶黄教徒并不表示后藏系统诸王是不虔诚的或者反对宗教的。获得胜利的教派的历史著作往往把噶玛丹均旺波写得很坏，现在清楚地看到，对噶玛丹均旺波一系的比较公正的评判被教义上的积怨和政敌间的挟嫌给掩蔽住了。这王子保卫了古老的传统，使之传下去并加以维护；西藏的保守势力聚集在他的周围，而他，虽然形势迫使他援助了那些改信信红教的蒙古人，但一直是那反对任何干预西藏事务的外来势力的一派的领袖。在他本人身上几乎体现着民族的思潮和

正规的传统。

他对于黄教的敌意，在前藏变得越来越强烈和咄咄逼人，这使他倾尽全力支持后藏的衰落中的寺庙。这些寺庙经历了战争风暴的摧残，或者随着一度繁荣的宗派的没落，正在一天天地沉沦到尘秽窘境。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觉囊领地内重修彭错林寺（p'un ts'ogs glin），修复纳塘寺（sNar t'an），修复巴浪（pa rnam）的桑木丁寺（bSam sdins）和塔巴寺（Tar pa）（134）。

同时后藏（上部藏或藏堆 Yar gTsan 或 gTsan stod）不仅须对付黄教的遍布各处的威胁，而且还得同西部出现的一个新的敌人打仗，这人就是拉达克王僧格南杰（Senge rnam rgyal）。这次战事在《拉达克编年史》里有扼要的记载，从那里我们得知这次军事远征结果是僧格南杰吃了亏。可是事态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变化。藏巴汗在前藏地区的严重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他无法更多留意于干燥的西部地区：僧格南杰在西日噶莫（Shi ri kar mo）战败（《拉达克编年史》Chronicles of Ladakh, p. 40），取得的是旧日边界应该维持原状，其领土因近年的屡次征服而扩张，竟远抵后藏的门户，这就是说东抵恰合塔河（Charta）（135）上的南木林。这场无益的战争的起因不明：它也许因边界纠纷而爆发，或者也许由于藏巴汗应请求去援救古格（Guge）的残余的王子们，如果我们相信古格王曾经为其嗣子求婚于藏巴汗之女（136），则藏巴汗还是古格王子的亲戚。

这位藏巴汗，在他最后的覆灭前夕，为了维持霸权，斗争得极其坚韧顽强，竟使他的名字传至欧洲。他的名字同中部西藏的天主教传教团的短促光荣的经历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传教团是在1626年到1632年间由喀切拉 (Cacella) 和喀布若尔 (Cabral) 试着建立的。

关于这个在西藏中心的传教尝试的种种遭遇，耶苏会神父韦赛尔斯 (Wessels) 已经作了详细的叙述<sup>(137)</sup>，我们无须重复大家已知道的东西。我们只要提醒读者，从这些传教士的叙述，无论是在古格的德安瑞特 (de Andrade) 或者在日喀则的喀布若尔 (Cabral) 的记述，都可以看出，这位王子对这些教士是给予了很好的款待的。而传教士们，即以他们的到来，告诉了王子世界的广大不容置疑，并且使他感知上帝 (God) 的新的启示。

喀布若尔在1626年遇到这位年方二十二岁的青年王子。喀布若尔描绘这位王子的形象极多溢美之辞。他说他仪表漂亮，为人虔诚，对穷人慷慨乐施。他住在日喀则一座山顶上的宫殿里——现在则有一所中国碉堡建立在这座山上。宫殿盖得象葡萄牙的城堡，他和他的宫廷和卫队住在这里，过着极其豪奢的生活；他的房子金碧辉煌，居室都值得瞻仰，尤其是收集古玩的房子，由于有钱，他从各地搜集了玩物。这里有中国锦缎及可以同葡萄牙丝织品媲美的其他质料制成的帷幔 (Wessells, p.p.3—4)。可是喀布若尔说这国王并不看重杂布兰 (Tsaparang) 的僧侣，这些僧侣住在离日喀则不远的一座寺院里，这里是札什仓布的阿里札仓 (grva t'saṅ)。

现在让我们回到正文上。藏巴汗的坚决态度只能使黄教越来越依靠蒙古人，蒙古人现在已经转信黄教教理，同时使黄教千方百计地煽动这位新的和握有大权的领袖的野心，固始汗的强大游牧部落紧靠边境，固始汗的虔诚和专一信仰使

他本人多少享有不无夸张的威望。不但黄教上层与固始汗之间信使往返频繁，而且格鲁派的僧侣经常被召集起来为这位蒙古大君的军队举行宗教仪式，祈求福荫。

蒙古同白利的作战耽搁了入侵西藏，而蒙古之征伐白利完全取得黄教的同意，黄教的领袖们劝固始汗首先击败白利，以解除黄教在西藏东部面临的危险。格鲁巴此一举可能是害怕白利会同后藏达成谅解，以致哲蚌、色拉、和甘丹寺，两面受敌，处于危险的境地。按照达赖五世罗桑嘉错的说法，这正是本教王的主意(p. 98b)。另一方面固始汗也时时打算消除对他的后方的任何可能的突然袭击，因此首先讨伐白利正是按照蒙古和黄教双方共同的计划进行的。固始汗后来远征入藏并同后藏的第悉作战正是黄教的策略的必然结局，这个计谋早自锁南嘉错时即在酝酿；格鲁派取代了红教在蒙古人里所进行的宗教宣传，用意就在于寻找某种支持以确立它在西藏的统治权。甚至在以后一些时候，熟悉西藏事情的外国观察家都能证实固始汗是应达赖喇嘛与其宫廷之请而干涉藏事来的，达赖与其大臣们为了彻底解决其竞争的敌手毫不犹豫地招引外援。

“大喇嘛正是由于一开头就受到王的蔑视而被惹怒，(被王(Le Roi)所惹怒)，向其邻境青海的鞑靼人请求援助。……固始汗，在洪台吉以及同族其他王子的援助下，组成大军马上进入西藏，击攻藏巴汗(Le Roi Tsampa)，在几次战斗后，把藏巴汗在一次不大不小的战役中击败，俘虏了藏巴汗，不久就处死了他。就是仗着这个汗王，大喇嘛才得以成为西藏的最高统治者”(138)。

1641年(铁蛇年)固始汗最后征服了喀木的六“岗”



(sGañ); 六岗的领袖就是白利王,白利王战败逃脱不果而被杀。在这些晚近被西藏本教的顽固的卫道者所统治的地区内,佛教再次取得胜利;许多受监禁的佛教僧人被释放出来。很可能,由于蒙古王的保护下的喇嘛们的挑唆,本教徒这次成为胜利者报复的牺牲品。喀木一旦平定了,固始汗就腾出手来对付西藏本部。

固始汗用了一个策略,为了不惹起后藏的疑心,他把居住在札什伦布的班禅请回到拉萨同黄教的首领们商量一致,放出风声说他要去青海。同时协敖就参加到蒙古军队里来。固始汗出发向后藏,而把他的两位妻子托给色拉、哲蚌寺照顾。第悉藏巴汗这时派出了一名官员叫戎巴达津巴(Ron Pa rTa mgrin pa)探听消息,尤其是协敖的意图和动向。协敖,正如上述,是与后藏势不两立的仇敌,似乎在这事件的全过程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可是,藏巴汗的特使竟一无所获,而黄教在后藏地区的情报工作倒组织得更好。蒙古军队开始逼近后藏:波东古彦(Bo don gu yen)带着军队,经过达陇,截断了条条大路。战争的信号已经发生了,各个贵族以往暗中左袒这一派或那一派,这时不得不公开表示态度了。协敖活动得相当利害,为了把拉加里和其他南部居民拉到黄教一边,他派出了有影响的使节,到处劝说和组织。事态迅速连续地发展到了高峰;全部中部西藏都捲入这场战争,现在这是一场决定西藏的前途和敌对教派的命运的战争。达赖五世很少提到蒙古人打仗,仅仅叙述贵族的态度和协敖的事迹。当藏巴汗先在札噶尔(Brag dkar)、继在梅托塘(Me to'g tañ)被蒙古军队打败之后,据隆多喇嘛记述(p.156),战争还延续了七个月。

最后，在1642年，战斗结束了：经过了一场顽强的抵抗，后藏统治者的首府，即日后日喀则寨所在地，被占领了，噶玛丹均遇俘被害。这一事件在西藏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连欧洲也知道了。张诚（Gerbillon）神父1687年到达中国，在这些事件过去多年后他写道噶玛丹均是西藏最伟大的世俗统治者，简单扼要地总结了噶玛丹均被害的经过：

“……约六十年间，西藏（Thibet）或称Toubet, Thibet和唐古特（Tangout），被一位当地的国王所统治着，他的名字叫藏巴汗（Tsanpa han），汉人在史书中称他为赞普（Tsan pou）。

这位王子过去非常有权有势……；同时在布达拉（Poutala）——我们旅行家曾不加区别地叫Botala，拉萨（Lassa）和Barantola的地方，住着一位大喇嘛，当地称之为达赖喇嘛，虽然如此，但达赖喇嘛并非当地的世俗的统治者；当时的统治者是藏巴汗，藏巴汗失去王冠的情节，我下面就要讲一下。

蒙古人尊敬达赖喇嘛如地上之神，认为藏巴汗对待达赖不十分体面，唯有他们才能对那些轻视达赖神圣地位的行为施加报复；我们谈过的厄鲁特第三支的汗王联合巴图鲁洪台吉（Patouru hum Taiki）带来的人众，对西藏的国王发起攻击，在列阵的战斗中打败了藏王，并把他俘虏，在让人杀死藏王后，把西藏王国交给了大喇嘛<sup>(139)</sup>”。

张诚在中国写了这些话。中国对这些事件给予极大的注意。在决定性的战役开始前，交绥双方已经向满洲崇德皇帝说明了情况，陈述了各自的要求。

1642年10月(140),以伊拉固克三代青绰尔济(ilarugsan Säčän C'os rje)为首的西藏代表团抵达沈阳,带来达赖喇嘛、藏巴汗即后藏王、藏巴汗所支持的红帽喇嘛噶玛巴的信件。从许多理由看来这时机似乎选择得合适。明朝正在走向崩溃,满洲清朝即将取而代之。西藏因内部的战乱弄得四分五裂,遍地荆榛,目前正由蒙古军队驻守,西藏了解到一个开放门户招致外力的入侵的政策所带来的危险。

藏巴汗希望从占领绝大部分的中国的新政权这里找到支持和补偿,达赖喇嘛希望抵销固始汗的干预,都从中国对西藏的原有的保护权这方面打主意。对立的派别既然不能达成协议,都想向满洲皇帝陈诉,请求最高判决。1639年起,满洲皇帝派去使者带着无所可否的信件交给达赖喇嘛和西藏的统治者藏巴汗。这信件不具皇帝的名字,请求派来一些能传法的僧人;第二封信专给达赖喇嘛<sup>(141)</sup>。可能崇德皇帝感到西藏的局势不稳定而且相当危急,有意含糊其词,以便亲聆其使节关于事件过程的报告。

1642年西藏派来的使者受到清廷隆重的接待,在盛京(沈阳)住了八个月。最后他们带着各样的信件回藏,这些信件依照所送致的不同的对象而口气也不一样。在使团里还增加了由皇帝指定其他的人们(几乎全是僧人,即格隆[ dge slon ] )。

在这些信件里首先当然是送给达赖喇嘛的,达赖因为最新事态发展的结果已经变成西藏的最高权威。但是皇帝并不想偏袒一方:皇帝通过其代表团或其他渠道了解到西藏分裂为许多派别,相互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其实这斗争不过是涂上一层宗教的色彩的难于调和的利益冲突而已。西藏在两个

有势力的宗派之间依违不决，而两派各有世俗势力做靠山。所以皇帝并不想捲入，只不过给达赖喇嘛送了厚礼，在信里他用了比给别人的信更加坦白的話；他殷勤誇贊达赖善心广传佛法。在给红帽噶尔玛（Ko eul ma）的信里他答应遵照佛法的传统的宽容精神敬重僧人，可是送噶玛巴的礼品则逊于他赠与达赖的（142）。

给藏巴汗即噶玛丹均的信里，他的话就圆滑得不可捉摸了。藏巴汗的死讯还没有传到中国，但是战争失利已经知道了；所以皇帝已预见到藏巴汗的毁灭，但对事态发展还有所怀疑，只要求藏巴汗呈上一份报告并勉励他尽职。

在写给固始汗的信里，他的话更加模棱两可。皇帝盯着固始汗的行动，同时却采取超然于教派斗争之外的姿态。他要求派一些喇嘛前来传法，又表示不应该对红教黄教有所偏向，只要有德行的即可派来。

我们所见到的这些件中，没有一件谈到封文或头衔：无论对达赖喇嘛或对固始汗都没有授予称号。皇帝只限于回答他们的来信并按礼仪回赠礼品，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其他教派的领袖们也接到皇帝的书信，如萨迦派，主巴派，达垅派。他谨慎地表示大公无私；中国不介入教派之间的争论，的确，从中国宫廷里发出了和平的言词，既明智又清醒。

我们现在该排列出这些信事件发生的准确的年代顺序了：舒勒曼（Schulemann）（p.138）倾向于把1640年定为藏巴汗战败之年；克彭（Köppen）（pp.152-156）认为在1643年；柔克义（Rockhill）在《拉萨的达赖喇嘛》（《通报》1910，p.8 n.2）把时代定在1641年到1643年之间。达斯（s.chandra Das）在所著《旅行记》和绰玛（Csoma



de körös)在所著《文法》(p.190)之中都定在1642年。1642年是正确的年代。因为在达赖五世罗桑嘉错和松巴堪布的藏历纪年已经无可怀疑地指明噶玛丹均战败于1642年，他用军队捍卫到最后时刻的王国也同他本人生命一起在这年结束了。对手从世间消失了。西藏从此平定了，达赖喇嘛从固始汗手里接受了很多礼物和十三万户的封赠（p.106p）。

格鲁巴在经历这些事件之后就这样地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而战胜者固始汗摆出一付宗教信仰的恩人和保护人的样子，至少在表面上把原有的世俗的权力还给黄教僧人。黄教在拉萨奏凯登基，拉萨再次成为雪域的首都，年轻的罗桑嘉错，现在带着不可冒犯的威严的佛光，坐上了布达拉宝座。这宝座就是异族军事力量和他的宫廷臣属的外交才能共同的奉献物。

我们在这里叙述的种种事件中的突出人物并不是达赖五世，他还太年轻，既无能力推行他的意愿，也不能应付这样复杂的事态。在这样风云变幻、危急存亡之秋，格鲁派恰好是由一些计谋多端、谄练世故的人所掌握的，象协敖锁南饶登（bSod nams rab brtan），关于他，我们已经多次谈过，象强佐衮乔群培（dkon mc'og c'os 'p'el），此人以高度的技巧施展计谋，掌握着黄教派的命运和前途的舵轮，安全地渡过当时风浪汹涌的海洋。

野心虽然很大，但这个教派的实力还是微弱的，敌人强大，不肯妥协，如果格鲁巴打算巩固它的权力，战胜敌人，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耍弄政治阴谋和利用外族援助。后者奏效最快也最可靠。但经常的情况是：一朝吁请外援，就会最后剥夺了西藏的独立，维持着一种先在蒙古军队，继在中国

军队的保护之下的虚有其表的统一局面。

在内部斗争平息之际，和平的降临给西藏带来了领土的遭受入侵和独立的丧失。各代达赖喇嘛本人都不再相信权力和性命有保障，只得在外来的将军们和官吏们的意志前面低下头来。